

论西安西郊陕棉十厂唐壁画墓 M7 墓主身份*

卢亚辉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北京, 10087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北京, 100710

内容提要: 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 1996 年发掘了西安西郊陕棉十厂唐壁画墓 M7, 该墓虽未出土墓志, 但据出土的贴金彩绘天王俑、十二生肖俑、乐舞图等属于唐元功臣墓葬的丧葬元素来看, 其墓主的身份只可能属于唐元功臣、龙武军或内常侍中的一员。以政治文化集团的视角对唐墓进行考察可知, 隶属同一政治文化集团的人群其墓葬面貌和随葬器物往往呈现出一定的共性, 其背后折射的则是这一人群共同的经历、相似的身份与处境以及共同的政治文化认同与信仰。

关键词: 唐壁画墓 十二生肖俑 乐舞图 政治文化集团

隋唐墓葬分期与分区的框架已基本建立^[1], 如若进一步推进唐墓研究, 必须充分汲取历史学尤其是中古史等相关研究成果, 综合考量传世文献、出土墓志和墓葬材料, 将“考古学关于等级制度的研究与政治史、社会史以及个人或群体的命运相结合”^[2]。然而, 考古发掘的墓葬多遭盗掘, 随葬品已被盗扰, 墓志可能在墓葬发掘前就已出土, 墓志的缺失使得对墓主人身份的判定难上加难, 即便一些墓葬规模很大, 随葬器物丰富, 也很难被学术界广泛利用, 如下文即将展开讨论的西安西郊陕棉十厂唐壁画墓 M7 就属此例。

1996 年 3 月,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陕棉十厂 15 号住宅楼基建工地清理唐墓 9 座, 其中 M7 (下文统称“陕棉十厂唐壁画墓 M7”) 为一斜坡墓道单砖室壁画墓, 简报将墓葬年代定在唐天宝年间前后^[3], 这无疑是正确的。陕棉十厂唐壁画墓 M7 未见墓志, 无法知晓墓主的具体名讳, 然而该墓出土的贴金彩绘天王俑、十二生肖俑、乐舞图等丧葬元素为揭示墓主人的身份背景提供了某种可能, 以下试从上述三个方面详述。

一、贴金彩绘天王俑

陕棉十厂唐壁画墓 M7 出土的天王俑高 98 厘米, 头戴侧翻沿软盔, 盔顶饰尾翼上翘的孔雀, 人面略仰, 眼圆睁, 阔口微张露齿, 身着贴金箔明光铠, 两肩各饰一骨朵, 兽头吐袖, 当腰系缘带, 右手

* 本文为 2017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古时期墓葬神煞研究”(17JJD780001) 成果之一。

[1] 隋唐墓葬分期、分区、葬俗、壁画、十二时与墓室结构、仿木结构砖雕装饰、金银器、纸明器、腰坑、塔式罐等研究相关评述有: 齐东方:《隋唐考古》, 文物出版社 2002 年, 第 55—117 页; 李星明:《唐代墓室壁画研究》,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5 年, 第 6—11 页; 程义:《关中地区唐代墓葬研究》, 文物出版社 2012 年, 第 1—25 页; 李雨生:《北方地区中晚唐墓葬研究》, 北京大学 2013 年博士学位论文, 第 10—21 页; 单月英:《有关隋唐墓葬及出土器物分期、分区研究结果汇总表》, 沈睿文:《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隋唐五代》, 开明出版社 2015 年, 附表 3-1。

[2] 沈睿文:《章怀太子墓壁画与李守礼》,《安禄山服散考》,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年, 第 310 页。

[3]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西郊陕棉十厂唐壁画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2002 年第 1 期。天王俑、武官俑清晰图版见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 吴镇烽主编:《陕西新出土文物选粹》, 重庆出版社 1998 年, 第 86—87 页。



图一 陕棉十厂唐壁画墓 M7 出土贴金彩绘天王俑

握拳抵膝，左手分张如爪，小臂肌肉隆起，甲衣下缘贴饰金箔，内着袍，两侧袍裾提于膝上，足穿高靽软靴，踏于蹲卧的鬼怪身上，底部台座状若树（图一）。^[1]

在对唐墓中出土的描金（贴金）彩绘（三彩）器物进行系统梳理后可知，随葬描金或贴金器物的 38 处唐墓（群）中，除史道洛^[2]、左才^[3]、乐道仁^[4]、宁县秋树沟唐墓^[5]、何府君^[6]、秦安县唐墓 M1^[7]、张仁^[8]等 7 座墓外，其余均位于唐代两京地区，尤其是唐代京兆府附近，年代则集中于唐高宗至玄宗时期，其中唐高宗至武则天时期的墓主人主要为李唐建国元从及其后裔，唐玄宗开元天宝时期，随葬贴金或描金器物的墓主多为唐元功臣或内常侍。唐玄宗时期，随葬贴金或描金器物的墓葬有开元二十八年（740）杨思勳墓^[9]、陕西长安县南里王村唐墓。其中陕西长安县南里王村唐墓为一唐代墓群，未见正式简报或报告，只在图录中著录^[10]。从图录中列出的器物来看，南里王村墓群年代有前后之分，其中出土镇墓兽 1 件，高 56 厘米，胸部贴金，相近形制亦见于天宝三年（744）史思礼墓^[11]、天宝四年（745）雷府君夫人宋氏墓^[12]、乾元元年（758）章令信墓^[13]。南里王村墓群中另出土彩绘天王俑 1 件，高 68 厘米，局部贴金^[14]，形制与雷府君夫人宋氏墓一样。陕棉十厂唐壁画墓 M7 出土的天王俑高度为 98 厘米，略低于史思礼墓中出土的天王俑（108.2 厘米）及雷府君夫人宋氏墓所出天王俑（110~113 厘米），考虑到器物保存状况，或考古器物测量时可能存在误差，三者俑的高度相差不大，可见陕棉十厂唐壁画墓 M7 墓主人身份等级与史思礼、雷府君相当或略低。

二、十二生肖陶俑

陕棉十厂唐壁画墓 M7 出土生肖俑 11 件，泥质红陶，兽首人身，身着右衽交领广袖长衫，双手合拱于胸前，高度为 22.5~23.8 厘米（图二）。

泥质红陶十二生肖俑，从墓志纹饰中的兽首人身十二生肖借鉴而来，是“唐代佛教撰述中十二时兽

[1]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西郊陕棉十厂唐壁画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2002 年第 1 期；彩色图版见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吴镇烽主编：《陕西新出土文物选粹》，第 87 页。

[2] 原州联合考古队：《唐史道洛墓》，文物出版社 2014 年。

[3] 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辽宁朝阳唐左才墓》，《文物资料丛刊》1982 年总第 6 期。

[4]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晋南文物工作组：《山西长治北石槽唐墓》，《考古》1965 年第 9 期。

[5] 许俊臣：《甘肃宁县出土唐代彩绘俑》，《考古与文物》1982 年第 4 期。

[6] 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宁夏盐池唐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 年第 9 期。

[7] 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甘肃秦安县唐墓清理简报》，《文物》1975 年第 4 期。

[8] 王秀生、丁志清：《山西长治唐墓清理略记》，《考古》1964 年第 8 期。

[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城郊隋唐墓》，文物出版社 1980 年，第 83—86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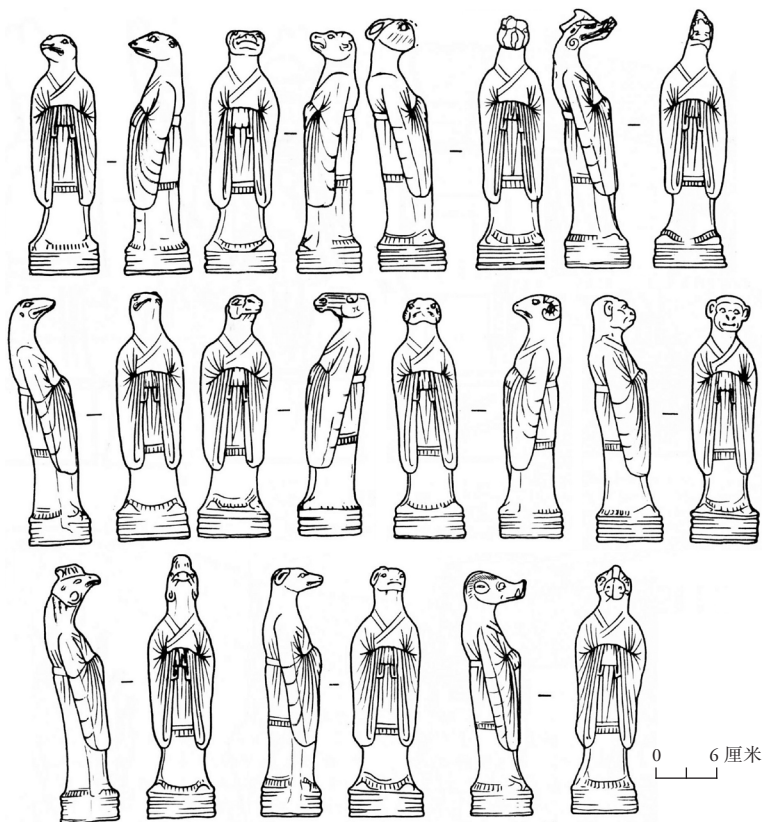
[10]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吴镇烽主编：《陕西新出土文物选粹》，第 77 页。简报定为天王俑，误。

[11]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省出土唐俑选集》，文物出版社 1958 年，图版六三一—图版八三。

[12] 张正岭：《西安韩森寨唐墓清理记》，《考古通讯》1957 年第 5 期；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省出土唐俑选集》，图版八四—图版九三。

[13]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东郊三座唐墓清理记》，《考古与文物》1981 年第 2 期。

[14]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吴镇烽主编：《陕西新出土文物选粹》，第 78 页。

图二 陕棉十厂唐壁画墓 M7 出土生肖俑^[1]

川机械厂唐墓 M3^[14] (图三, 8)、西安秦川机械厂唐墓^[15] (图三, 7)、陕西长安县大兆乡东曹村唐代墓群^[16] (图三, 1)、西安硫酸厂唐墓 M7^[17]。上述墓主人情况列表如后。

表中墓主明确的墓葬, 孙承嗣为兵部常选, 其父孙荆山为左豹韬卫伊川府左果毅游击将军上柱国, 宣威天山, 可知孙荆山属于府兵系统, 孙承嗣的夫人高氏未见明确出身。考虑到此时在唐朝军事系统

的观念渐渐与中国传统十二支观念相结合”^[1]的产物。目前考古材料所见唐代长安地区出土泥质红陶十二生肖俑的墓葬有开元二十四年(736)孙承嗣暨妻高氏合葬墓^[2](图三, 4)、开元二十八年(740)杨思勖墓^[4](图三, 9)、天宝三年(744)史思礼墓^[5](图三, 3)、天宝四年(745)雷府君夫人宋氏墓^[6]、天宝九年(750)祢仁秀墓^[7]、天宝十年(751)皇甫悦暨妻李氏墓^[8](图三, 2)、天宝十一年(752)郑君妻韦婢娘墓^[9](图三, 5)、至德三年(758)清源县主墓^[10]、乾元元年(758)章令信墓^[11]、上元二年(762)唐肃宗保姆凉国夫人王氏墓^[12]、元和三年(808)朱庭玘墓(图三, 6)^[13]、西安秦

[1] 陈怀宇:《从十二时兽到十二精魅:南北朝隋唐佛文献中的十二生肖》,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93—336页。

[2]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唐孙承嗣夫妇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2期。

[3]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西郊陕棉十厂唐壁画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1期。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城郊隋唐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83—86页。

[5]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省出土唐俑选集》,图版六三—图版八三。

[6] 张正岭:《西安韩森寨唐墓清理记》,《考古通讯》1957年第5期。

[7] 拜根兴:《唐代高丽百济移民研究——以西安洛阳出土墓志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305—306页;张全民、郭永淇:《唐代百济移民祢氏家族墓》,国家文物局:《2011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131—137页;张全民:《新出唐百济移民祢氏家族墓志考略》,杜文玉:《唐史论丛》(第14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2—68页。

[8]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长安高阳原新出土隋唐墓志》,文物出版社2016年,第198—199页。

[9]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长安高阳原新出土隋唐墓志》,第202—203页。

[10]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东郊庞留村的唐墓》,《文物》1958年10期;录文见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732—1733页;墓志拓片见中国文物研究所、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貳)上册,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140页。

[11]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东郊三座唐墓清理记》,《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2期。

[12]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唐凉国夫人王氏墓发掘简报》,《文博》2016年第6期。

[13]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省出土唐俑选集》,图版一二一。

[14] 吴春:《西安秦川机械厂唐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94年4期。

[15]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文物精华·陶俑》,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2014年,第230—234页。

[16]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长安县东曹村出土的唐代文物》,《文博》2003年第6期。

[17] 孙铁山、海云:《西安硫酸厂唐墓发掘简报》,《文博》2001年第5期。



图三 唐代长安地区出土泥质红陶十二生肖俑

生肖俑所出墓葬为：1. 陕西长安县大兆乡东曹村唐墓；2. 皇甫悦暨妻李氏墓；3. 史思礼墓；4. 孙承嗣暨妻高氏合葬墓；5. 郑君妻韦婢娘墓；6. 朱庭妃墓；7. 西安秦川机械厂唐墓；8. 西安秦川机械厂唐墓 M3；9. 杨思勖墓

唐代长安地区出土泥质红陶十二生肖俑一览表^[1]

墓主人	卒葬年	葬地	十二生肖俑简况	身份
孙承嗣暨妻高氏	736	陕西师范大学长安校区	高 21.5~25.8 厘米	右卫翊卫兵部常选, 父孙荆山左豹韬卫伊川府左果毅游击将军上柱国
杨思勖	740	西安东南 4 千米	高 60.5~66.5 厘米	故骠骑大将军兼左骁卫大将军, 知内侍事上柱国虢国公
史思礼	744	西安东郊郭家滩	高 38.9~42 厘米	壮武将军右龙武军翊府中郎将, 唐元功臣
雷府君夫人宋氏	745	西安东郊韩森寨	高 38~43 厘米	故正义大夫行内侍上柱国雷府君夫人, 故乐寿郡君
祢仁秀	750	长安区郭杜街	—	云麾将军左武卫将军上柱国、来远郡开国公祢素士之子, 虢州金门府折冲
皇甫悦暨妻李氏	751	陕西师范大学长安校区	—	扶风郡雍县尉皇甫府君, 李氏, 皇三从叔朝散大夫许州司功默之孙女
郑君妻韦婢娘	752	西北大学长安校区	—	弘农郡全节府别将荥阳郑公故夫人京兆韦氏
清源县主	758	西安南郊庞留村	生肖俑头 6 个, 已残	寿王李瑁故第六女赠清源县主
章令信	758	西安国棉四厂职工子校操场	十二生肖俑头, 残存 3 件	故武都侯右龙武军大将军, 唐元功臣
凉国夫人王氏	762	西安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	生肖俑残 7 件	唐肃宗保姆凉国夫人
朱庭玘	808	西安莲湖区土门	高 24.5 厘米	元从奉天定难功臣云麾将军, 行右监门卫率府副率上柱国左神武军宿卫
西安秦川机械厂唐墓 M3	盛唐	西安东郊韩森寨	残 7 件, 通高 20~23 厘米	—
西安秦川机械厂唐墓	盛唐	西安东郊韩森寨	高 26.5~33 厘米	—
大兆乡东曹村唐代墓群	盛唐	西安东安南大兆乡	残存 4 件, 高 18.1~22.5 厘米	—
硫酸厂唐墓 M7	天宝年间	西安西郊三桥镇	高 27 厘米	—

中有不少朝鲜半岛移民, 且像高慈、高崇德、高足酉等人均隶属左豹韬卫^[1], 不排除孙承嗣的夫人高氏父、祖为朝鲜半岛移民, 且任职左豹韬卫的可能, 故孙承嗣与夫人高氏的联姻可能缘于两人父辈均隶属左豹韬卫的背景。祢仁秀的父亲是祢素士, 祢素士为唐云麾将军、左武卫将军、上柱国、来元郡

[1] 蒙曼:《唐朝军事系统中的朝鲜半岛徙民》,《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图四 玄宗时代墓葬中的乐舞图之一

乐舞图所出墓葬为：1. 陕棉十厂唐壁画墓 M7；2. 嗣虢王李邕墓

开国公，祢仁秀本人曾累授明威将军、右骁卫郎将^[2]，在军队系统中任职。天宝十一年（752）郑君妻韦婢娘墓志中提及郑君为弘农郡全节府别将。杨思勖、雷府君均为内侍，史思礼、章令信为唐元功臣，后在龙武军任职，朱庭玘则是元从奉天定难功臣、左神武军宿卫，这似乎暗示着十二生肖俑可能属于禁军或内侍人员使用的。玄宗一朝，建立龙武军和设置官署，使得北衙禁军逐渐与南衙脱离关系，形成类似于内侍省的独立官僚体系和内部司法权，即“准内廷体制”^[3]，自玄宗代三朝开始，唐代宦官群体角色完成了从“仆”到“臣”的转变^[4]，且与佛教势力关系紧密^[5]，当开元天宝之际，“佛教撰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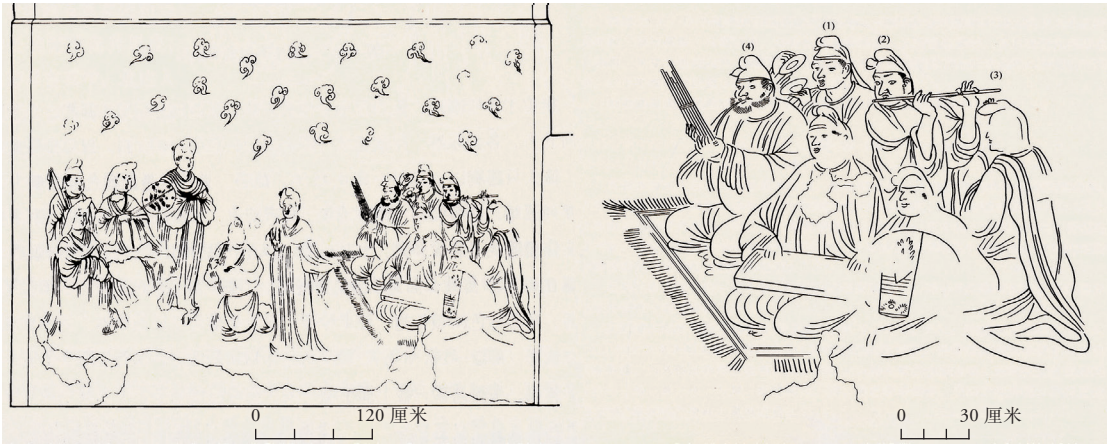
[1] 贞观十六年（642）李绍墓，在出土遗物登记表中有生肖羊、鼠、猪、鸡等，然墓葬平面图中并未有相关标注，简报中亦无相关描述。李绍墓于1956年发掘，2015年10月才正式整理出版（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陕西考古发掘资料整理研究》，三秦出版社2015年，第335—340页），相隔近60年，故本文不取该墓相关材料。

[2] 拜根兴：《唐代高丽百济移民研究——以西安洛阳出土墓志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305—306页；张全民、郭永淇：《唐代百济移民祢氏家族墓》，国家文物局：《2011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131—137页；张全民：《新出唐百济移民祢氏家族墓志考略》，杜文玉：《唐史论丛》（第14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2—68页。

[3] 蒙曼：《唐玄宗朝北衙禁军准内廷体制的形成及其影响》，《北大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16—236页。

[4] 李丹婕：《从“仆”到“臣”——玄宗代时期宦官群体角色的转型》，《中国典籍与文化》2010年第2期。

[5] 刘淑芬：《中古佛教与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9—69页；孙昌武：《唐代的宦官与佛教》，袁行霈主编：《国学研究》（第9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13—232页；严耀中：《唐代内侍省宦官奉佛因果补说》，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0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5—72页；李丹婕：《从“仆”到“臣”——玄宗代时期宦官群体角色的转型》，《中国典籍与文化》2010年第2期。



1



2



3

图五 玄宗时代墓葬中的乐舞图之二

乐舞图所出墓葬为：1. 李宪墓；2. 韩休墓；3. 苏思勖墓

中十二时兽的观念也渐渐与中国传统十二支观念相结合”^[1]，泥质红陶十二生肖俑也就在长安应运而生，而这无疑与龙武军、宦官群体在玄宗时期势力煊赫有关。至于两湖隋唐墓出土的十二生肖陶俑将另撰专文详述，需要强调的是两湖隋唐墓的年代值得推敲，如湖南长沙黄土岭唐墓 56 长黄 M024、湖南长沙牛角塘唐墓 M1、唐墓 56 长烈园 M004 这三座墓的年代均应在高宗至玄宗时期，不排除墓主为玄宗时期北来任职官员的可能。

三、乐舞图

陕棉十厂唐壁画墓 M7 在墓室东壁绘有乐舞图，图中有 7 人，演奏乐器的 5 人分别持竖箜篌、琵琶、箏、钹，还有 1 人乐器残缺，中间为一青年男性舞者（图四，1），这属于唐玄宗开元时期整顿之后形成的典型墓室壁画布局，结合玄宗时代墓室壁画乐舞图的已有研究成果^[2]，可知乐舞图亦见于开元十五年（727）嗣虢王李邕墓（图四，2）^[3]、开元二十七年（739）韩休墓（图五，2）^[4]、天宝四年（745）苏思勖墓（图五，3）^[5]、开元二十九年（741）让皇帝李宪墓（图五，1）^[6]、天宝七年（748）张去逸墓^[7]。其中韩休在唐玄宗时期位居宰相，逝世后获赠扬州大都督^[8]；苏思勖为内侍，常山县开国伯食邑七万户检校云韶使^[9]；张去逸为银青光禄大夫太仆卿上柱国，张去逸与张去奢为兄弟，唐玄宗之女常芬公主下嫁张去奢^[10]。据张去逸墓志铭文可知，张去逸为昭成皇后（唐睿宗昭成顺圣皇后窦氏，即唐玄宗、金仙公主、玉真公主之母）的亲外甥。张去逸有六子，张清为其中之一。据张清之子张怙墓志可知，张清娶肃宗之女郾国公主为妻。西安碑林中所藏《郾国大长公主墓志》云：“驸马都尉范阳张清，即玄宗之表侄，肃宗张后之爱弟。”^[11]

结 论

唐玄宗凭借其父唐睿宗与自己在北衙、南衙禁卫军的势力登上帝位，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一批唐元功臣，玄宗开元天宝年间龙武军、内常侍势力也逐渐兴起，这一批特殊人群的存在，深刻影响了玄宗时代墓葬的面貌，西安西郊陕棉十厂唐壁画墓 M7 随葬器物、壁画与杨思勖、苏思勖等墓相似，表明墓主人可能与苏思勖、杨思勖等人身份相近。出土相同的随葬品，可能表明墓主人身份相似，甚至有共同的经历，属于同一政治文化集团，陕棉十厂唐壁画墓 M7 墓主人的身份，最有可能属于唐元

[1] 陈怀宇：《从十二时兽到十二精魅：南北朝隋唐佛教文献中的十二生肖》，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 13 卷），第 293—336 页。

[2] 郭美玲：《西安地区玄宗时代墓室壁画经营与布局》，西北大学文化遗存研究与保护技术重点实验室等编著：《西部考古》（第 13 辑），科学出版社 2017 年，第 202—208 页。

[3]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唐嗣虢王李邕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2 年第 3 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唐嗣虢王李邕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 2012 年，第 79—81 页。

[4] 《考古与文物》编辑部：《“唐韩休墓出土壁画学术研讨会”纪要》，《考古与文物》2014 年第 6 期；程旭：《唐韩休墓〈乐舞图〉属性及相关问题研究》，《文博》2015 年第 6 期；郑岩：《唐韩休墓壁画山水图刍议》，《故宫博物院院刊》2015 年第 5 期。

[5] 陕西考古所唐墓工作组：《西安东郊唐苏思勖墓清理简报》，《考古》1960 年第 1 期；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第 595—596 页；乐舞图彩色图版见冀东山：《神韵与辉煌·陕西历史博物馆国宝鉴赏·唐墓壁画卷》，三秦出版社 2006 年，第 211—213 页。

[6] 王仲谋、陶仲云：《唐让皇帝惠陵》，《考古与文物》1985 年第 2 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李宪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 2005 年，第 151—154 页。

[7] 王仁波、何修龄、单暉：《陕西唐墓壁画之研究（下）》，《文博》1984 年第 2 期；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第 1620—1621 页；张岩：《张去奢、张去逸墓志考释》，西安碑林博物馆：《碑林集刊》（5），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7 年，第 69—72 页。

[8] [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一二六《韩休传》，中华书局 1975 年，第 4432—4433 页。

[9] 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第 595—596 页。

[10] 《新唐书》卷八三《诸帝公主》，中华书局 1975 年，第 3657 页。

[11] 张岩：《张去奢、张去逸墓志考释》，西安碑林博物馆：《碑林集刊》（5），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7 年，第 69—72 页。

功臣、龙武军或内常侍中的一员。

至此，我们可以谨慎地对个别未出墓志的唐墓墓主人的背景身份进行判定。首先，依据唐代两京尤其是现在西安地区相对成熟与完善的唐墓分期框架，对未出墓志的唐墓进行考古学年代上的断定；其次，系统梳理未出墓志唐墓的丧葬元素，如青龙白虎图案、木门、埋葬位置、贴金彩绘器物、十二生肖俑、乐舞图等，找出具有相同丧葬元素的唐墓，结合墓志材料与传统文献，对墓主人身份进行考察，寻找墓主人身份、背景与经历的相似点，进行归纳总结；最后，注意在大的历史背景中对所得出的结论加以考察、验证。

古代中国“只有各级政治体能够有效地组织人们共同行动”^[1]，中古时期亦不例外，“一个政治体，不仅其规模、结构等实体性特征，还有其赖以运行的制度，以及制度背后相应的观念体系，用以指导在此政治体中人们的行动，以及塑造人们对于该共同体以及自身的认识”^[2]，反映在考古材料中，则是隶属同一政治文化集团的人群，其墓葬面貌和随葬器物往往呈现出一定的共性，其背后折射的则是这一人群共同的经历、相似的身份与处境，此时对政治文化的认同往往会超越族群与地域的限制，在唐玄宗时期对丧葬不断整顿的背景下，陕棉十厂唐壁画墓 M7 墓主人的身份只可能属于唐元功臣、龙武军或内常侍中的一员，极有可能是唐元功臣。若上述判断无误，以政治文化集团的视角来对个别未出墓志的唐墓进行考察，则很有可能激活一批未被重视的唐墓材料。

（责任编辑：吴昌稳）

Research on the Identity of the Occupant of the Tang Dynasty Tomb with Wall Paintings at Shaanxi Tenth Cotton Plant

Lu Yahui

Abstract: The tomb M7 located at Shaanxi Tenth Cotton Plant was excavated by Shanxi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in 1996. The excavation bulletin of the tomb was published in *Archaeology and Cultural Relics* in 2002. We had no idea who the occupant of the tomb was for lack of the epitaph. However,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gold-traced figurines, the Chinese Zodiac Figurines and the Music and Dancing Picture, the occupant of the tomb should be a member among the Tangyuan-Gongchen Bloc, the Royal Guard called Longwu or the Eunuch. The people who were attached to the particular cultural-political power bloc had the similar life experience, status and situation, so their tombs and the funerary objects often show certain commonalities. They were identified with the Tang dynasty's political culture instead of ethnic groups or regions.

Keywords: Tang Mural Tomb, The Chinese Zodiac Figurines, The Music and Dancing Picture, Cultural-Political Power Bloc

[1] 胡鸿：《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第 15 页。

[2] 胡鸿：《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第 18 页。